

汪曾祺笔下的春菜

贵翔

汪曾祺先生不仅是一位作家,还是一位地道的美食家。无论是故乡美味,还是家常小菜,经过他的描绘,都能平添一份文人的闲情雅致。在春天到来之际,分享几样汪老笔下的春菜,带大家体验一下春的味道。汪老的故乡是江苏高邮。春天一到,踏青挑菜(也就是挖野菜),是当地的风俗。在屋里闷了一个冬季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到野地里活动,呼吸新鲜空气,看看养眼的野花绿树,绝对是一大乐事。汪老家

乡的野菜主要有枸杞、荠菜和兰头。汪老在他的散文《故乡的野菜》中写道:“荠菜是野菜。但在我的家乡却是可以上席的。”汪老所讲可以上席的荠菜吃法是凉拌,做法是把新鲜的荠菜焯过后切碎,与香干细丁一起摆成宝塔形状,浇上姜末、麻油、酱油,待吃时将“宝塔”推到拌匀。有趣的是,汪老晚年到北京居住以后,少了新鲜的荠菜,就以菠菜替代,做法完全相同,成了汪老家中待客的下酒菜之一,

极为其文友所称道。

汪老笔下的另一种野菜是枸杞头,吃法应该与荠菜相仿,也是凉拌。他描写卖枸杞头女孩子的文字却美到了极致:“春天的早晨,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,就可以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。叫卖枸杞头的多是附郭近村的女孩子,声音很脆,极能传远:‘卖枸杞头来!’枸杞头放在一个竹篮里,一种长圆形的竹篮,叫作元宝篮子。枸杞头带着雨水,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……”

汪老在小说《大淖记事》里还提到一种春菜名为菱蒿。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:“春初水暖,沙洲上冒出很多紫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菱蒿,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”说起菱蒿,我们很快就能想到东坡先生《惠崇春江晚景》中的一句“菱蒿满地芦芽短”。据汪老在《故乡的食物》中讲述,东坡先生诗中说的菱蒿生在水边,与芦芽为伴,正是他们家乡所吃的菱蒿。为介绍菱蒿,汪老还在《大淖记事》的书页下方加了一条注释“菱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,粗如笔管,有节,生狭长的小叶,初生只有二寸来高,叫‘菱蒿子’,加肉炒时清香……”读着这样的文字,似乎已经闻到了一股清香味,不知不觉咽下一点津液。

他是南梁文坛领袖,当世才子,美文迭出;他为官清正,众口皆碑。他就是大学者兼藏书家任昉。

任昉(460—508)字彦升,南梁乐安博昌(今山东寿光北)人,《梁书》《南史》有传。其父任遥,曾任南齐中散大夫。其母河东裴氏,大家闺秀,对任昉早年培养教育作用甚大。据《南史》本传记载:任昉“幼而聪敏,早称神悟,四岁诵诗数十篇,八岁能属文,自制《月仪》,辞义甚美”。他十六岁始为官,历仕宋、齐、梁三朝,在宋官至太常博士。任昉很得王俭赏识,所拟公文,王予赞曰“当世无比”。王俭又为任命题作文,任提笔而就,王看罢惊呼“正是吾腹中所欲言者”。王又自作一文,让任润色,任“因定数字”,王阅后,轻拍几案叹道:“后世谁知子竟能定吾文。”任昉后得竟陵王萧子良赏识,成为“竟陵八友”之一。起初,王融凭其门第高才,自夸“天下无双”,及见任昉文章,恍然若失。齐明帝打算提拔任昉做宰臣,只因他过于正直,上表直抒胸臆,惹得明帝不快,故一直未

得升迁。《梁书》本传说任昉“雅善属文,尤长载笔,才思无穷,当世王公表奏,莫不请焉。昉起草即成,不加点窜。沈约一代词宗,深所推挹(即推崇)。”他和沈约在齐、梁时代为两大笔杆子,有“任笔沈诗”美称。

任昉和萧衍同为竟陵王座上客。有一天,萧

对任说:“他日我如登宰府,就命你为管文书之官。”任亦开玩笑回禀:“将来我如做首揆,就令你统领骑兵(注:萧衍善骑)。”任昉哪里想到,没过几年,萧衍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萧衍没有食言,命他为主管国家图籍档案的最高长官——秘书监。他上任伊始,立即着手整理国家藏书,“自齐永元(499)以来,秘阁四部,篇卷纷杂,(任昉)手自雠校,由是篇目定焉”。

任昉于梁朝之官藏有所贡献。《梁书》本传载:“昉搜籍无所不见,家虽贫,聚书至万余卷,率多异本。昉卒后,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,官所无者,就昉家取之。”任昉藏书不仅丰富,且多有精校本,还编有藏书目录。他去世之后,所藏典籍也对官藏有较大贡献。

襄助官藏的藏书家任昉

陈德弟

如果你是一个既喜欢文学又喜爱写作的人,那么,你看到这个题目,八成将会心一笑。是的,读书,唯求痛快,但如何才能痛快读书呢?

首先,看书不跟风,从自己的爱好出发,看不进去的书就放下。读书跟吃饭,一个滋养精神,一个满足身体;有相同点,也有不同处。从效果来看,其最大的不同处在于:吃饭不能挑食,不只吃自己爱吃的,才能保证身体健康;但是,读书,尤其是读文学书,你看不进去的,不

对胃口,千万别硬着头皮去读。因为,凡是“硬着头皮”去干的事,大都费力不讨好。而且,即便你“硬着头皮去读”了,你也读不懂,一无所获。

所以,涉及文学写作方面,读书时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,且自己读得进去的。那些暂时看不进去的书,可能是自身历练不够,也可能是性情不匹配。总之,不要强迫自己。

痛快阅读

闻云飞

《红楼梦》,可以说是中文小说界的“扛把子”,但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喜欢它,都能读得进去。作家王蒙在做讲座时就说过这么一句话:“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写出人人都喜欢的作品,据我了解,现在北京就有一大批青年作家不读《红楼梦》。”所以,我们如果为了文学创作去读书,千万不要逼着自己去读所

谓的经典。那么,读什么书呢?不管是新书,还是经典书籍,在确定是否要买或要读之前,先试读几页,如果能读得进去,或者还想继续读。那么,买下来,回家痛痛快快地读完。

而且,对于读完之后,感觉意犹未尽的书,一定要再读。当然,如果能写一下读书随笔,那就更好了。因为这就是我们汲取文学营养的过程。



●格言画 杨树山画

最大的骄傲与最大的自卑都表示心灵的最软弱无力。——斯宾诺莎

司马光惜书

迂夫子

司马光住在洛阳时,建了一处“独乐园”,内藏万余卷书。这些书中,即使是司马光早晚常读的,也都崭新如初,就像从未翻过一样,这是为什么呢?

司马光曾对儿子司马康讲自己读书的事,揭示了原因。每年从三伏天的头伏到重阳节,只要天气晴朗,司马光就会在院子里摆上几案,把书放在太阳下暴晒,所以即使年深日久,书

也不坏。每次开卷读书,司马光也一定要先确定几案是否干净,还要再垫上垫子,把书放在上面,然后才端坐读书。有时要边走边看,就用方板托着书,不敢空手捧着,怕手上的汗渍污染了书。翻书时,更是小心,用拇指沿着书的侧面顶起一张,再用另一指小心夹着,绝不会揉捻书页。作为一代史学和文学大家,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,单是由他付出毕生精力主持编纂的《资治通鉴》,便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文史学上的成就,自然与司马光博览群书密不可分,而从他对书籍的爱惜上

来看,竟然细致到连晒书、启书、翻页都十分讲究,唯恐损坏书籍,实在让人叹服。

司马光曾说:“贾豎藏货贝,儒家惟此耳,然当知宝惜。”商人以珍珠宝贝为宝,读书人却把书籍当作宝贝。在读书人看来,书籍会融入人的头脑,与人合而为一,似此,书就变成了精神养料,人也会因为书的滋养,成为非同寻常的人。

语·子张》)。孟子直截了当地说,尽信书,不如无书,武王伐纣,血流漂杵,是夸大其词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,此语带有考据理证法的性质。
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,在选材时亦有所考证,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略考其行事”。刘向父子整理官藏,凡疑伪托之书,均于《七略》一一注明。王充《论衡》中《书虚》《儒增》《艺增》等篇,多有古书不信实之论。郑玄遍校今古文经,考证是非,“删裁繁诬,刊改漏失”(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),树起了“汉学”的大旗。魏晋之后的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,对古书不乏精湛考证。唐人考证经书,由以前“正文字对错”为主,转为以“正立说是非”为

主,此为一大进步。宋人排斥唐人的“义疏之学”,解经直抒胸臆的“理学”成主流,树起了“宋学”旗帜。“汉学”考实,“宋学”阐发,对立极其尖锐,但仍有不少学者从事考据,如晁公武、陈振孙考订图籍,欧阳修、赵明诚考录金石,郑樵、王应麟征考文献等,考据并未废。明代承宋遗风,提倡“理学”,考据活动见衰,但也还有部分学者考证古籍,如胡应麟撰《四部正讹》,系考证伪书之作。考据能成独立知识体系,并形成学科,至清代才完善,且达到了极致。



书文化漫谈之十一

凌濛初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里有一篇《转运汉巧遇洞庭红,波斯胡指破鼉龙壳》记述了一篇时来运转、离奇美妙的故事。

明朝成化年间,有一小商贩叫文若虚。他因经营不善,赔本败家,蹉跎度日。忽一日,旧友约他租船出海营商。他很尴尬,就用身边仅有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筐当地很便宜的红果。船主嫌货贱占仓,就把那几筐红果堆在了船头。多日航行,船到了一个叫吉零国的地方,船上的商人们都忙着卸货经营去了。文若虚一人在船上,打开苫布,那几筐红果竟然颗颗肥硕,红艳夺目,在船头泛出一片红光,大概是清风海浪滋润的结果吧。此时,恰遇该国皇家卫队来到港口,寻购各国奇珍异宝,突见船头红光一片,便前来观望。因为没有见过红果,卫队士兵品尝后又觉酸甜可口,认为是东方奇异果,他们便以一两银子一颗的价格买断。文若虚赚了数千两

银子,成为全船首富。

船行返航,路遇狂风,暂泊无人岛。文若虚上

岛拾到一个巨大的龟壳,心想可做床用就背回船上,大家都讥笑他穷根未上。船到福建,一波斯土豪见到龟壳大惊喜,问卖何价,文若虚见土豪求之若渴,咬了咬牙说:5万两银子。土豪大喜过望,连说不能反悔。众人问何故,土豪令人锯开大壳,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大珠宝,土豪讲此龟为鼉,千年以上,壳内应有24颗大宝珠,每颗珠子都值5万两银子。同船的人听了后,都替文若虚后悔,但文若虚不反悔,表示已知足。

这个故事给人的启迪,首先是人要敢于抓住机会才能转运。文若虚正因抓住了出海经商机会,才得到了“第一桶金”。其次,人要知足常乐。文若虚在卖掉鼉壳时体现的诚信为本和知足常乐的品质,才是一个人时来运转的关键所在。

知足常乐

侯治军

考据学简谈(上)

史辰

考据或称考证,就是考察和求证,通过相关证据的搜集和考辨,来证实并弄清文献或历史事实的真相。可以说,客观事实一经文字记录,就会部分失真。后人参考前人的著述时,由于年代久远,时空隔阂,对于语言文字理解不同,或因抄刻流传致误,再因文献浩繁,难以浏览,加之个人偏见,或出于某种目的作伪,等等,其所写成的书籍和文章,就会有很多不真实、不准确的地方。郭沫若在《十批判书》中说过,搞文史研究,材料真伪或时

代不清,或缺乏材料更危险,缺乏材料顶多得不出结论,而不正确会得出错误结论,这样的结论,比没有更有害。古今相同,做研究之前,一定要对参考文献进行分析和考证,求真求实,惟其如此,才能写出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文章。于是,考据就产生了。

考据滥觞于质疑文献记录,孔子弟子子贡怀疑对商纣王的罪恶记载,说纣王不善,不像世人所说的那么严重,因为君子恶居下流,所以才将天下坏事尽归之(《论